

俄共的戰略與中國之命運

——「十月革命」百年祭

• 袁偉時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年多，歐洲局勢趨於穩定，俄共轉身關注東方，冀圖通過顛覆殖民體系，消滅資本主義，建立自己的安全屏障，中國遂成為它的首要目標。通過組建中國共產黨和與孫中山、馮玉祥結盟，俄共的戰略曾掀起大浪，但終歸失敗，原因在於其與人性對立，與現代社會的要求背道而馳。共產主義的三大信條——消滅資本主義、打倒帝國主義，以及階級鬥爭路線導致中共困頓；改革開放拋棄其中之二，開創了新局面，但關鍵一條——公民的自由權尚在纏鬥。百年崎嶇留下永遠不應忘記的教訓。

關鍵詞：「十月革命」 中國共產黨 共產國際 孫中山 中國國民黨

「十月革命」改變了二十世紀人類歷史行程。除了對撲滅德國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有很大貢獻外，一部七十四年的蘇聯史乏善可陳^①。它帶給世界最大的變化是把共產主義從思潮變為擁有三分之一人類的十五個國家的政權，使這些國家的人民歷盡千霜萬雪。

1920年代開始，中國人「以俄為師」，接連結下兩個果實：從廣州到南京實行黨國體制的國民政府；於1921年組建，並在1949年贏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兩者對中國社會面貌和中國人命運影響之深，世所罕見。研究中蘇關係史的學術成果很多，本文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考察「十月革命」後俄共對中國的戰略，以及1920年7月共產國際（俄共的附屬機構）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和〈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這兩個文件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理論和行動的基本依據。

一 俄共(共產國際)的戰略目標和行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四大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坍塌，民族獨立原則基本上在歐洲確立。芬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等多個新國家應運而生；奧地利、匈牙利、土耳其等在廢墟中重生，失去昔日光環，淪為二流乃至三流小國；柏林、漢堡、布達佩斯等蘇維埃暴動相繼失敗，歐洲局勢趨於穩定。蘇俄西進的希望破滅，列寧和俄共遂將注意力轉向東方；把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變為自己的附屬國或盟國，成了其戰略目標。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把民族、殖民地問題作為主要議題，通過了主要由列寧起草的〈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和職業革命家印度人羅易(Manabendra Roy)起草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以下合稱〈提綱〉)，作為行動綱領。

在這個大戰略中，中國被定位為「政治上被壓迫而且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地位的國家」^②，成為落實這個戰略的主要戰場。為此，1920年代初，俄共(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工作的各色人員絡繹於途，並選擇上海作為主要活動基地，推動中國和東亞革命。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組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和共產國際戰略結合的產物，其開端是「一群知識份子在搞革命」^③。當時主要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都是這些共產主義知識份子「到群眾中去」發動起來的。

正如一位法國當代史家所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着自由歐洲的文明的自我毀滅，大戰讓思想真空的豁口打開，各種關於階級和種族的意識形態趁虛而入，而這些意識形態又都將內戰和對外戰爭當成統治原則。」^④歐戰徹底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弊端，人類向何處去？補苴罅漏的各式社會主義和激烈的共產主義思潮在全球流行，並通過各種途徑湧入中國。得益於北洋統治下的中國思想文化環境比較寬鬆，從1919年開始，各派報刊紛紛刊登文章介紹這些新思潮。

當時一些最激進的知識人選擇皈依馬克思主義。據楊奎松的研究指出，「1920-1922年間中國至少出現過7個自稱是共產主義的組織或政黨」^⑤。以參加1921年7月23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組織來說，國內共有「六個小組，有五十三個成員」^⑥。其中最早的共產主義組織出現在四川，是中國人自發組織起來的：「我們的組織是由一些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教師建立的。他們起初成立了一個研究會，在這裏聚集了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大學生。……在1920年3月12日，我們的組織在重慶正式成立了。」^⑦而在俄共派來的維經斯基(Gregory Voitinsky，又譯魏金斯基、維丁斯基、威琴斯基；化名吳廷康、伍廷康、胡廷康等)推動下在1920年8月下旬成立於上海的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則成立於同年10月。可見，即使沒有外力介入，中國也必然誕生共產主義政黨。

不過，中國共產黨由不足百人的小組織，在短時間內出現爆炸式增長，成為全國性的大黨，決定性因素則是共產國際蓄意推動和大力幫助。

1920年4月，先是維經斯基以設立華俄通訊社的名義偕同夫人和翻譯楊明齋等人來華；先後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陳獨秀，與陳商定並出資支持建立中國共產黨，幫助各地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劃召開中共一大；出版宣傳刊物和書籍（包括《共產黨宣言》等譯作）。中國知識階層懂俄文的人很少，共產主義先驅們多半從日文書刊中攝取共產主義知識。對不懂外文或難以獲得外文資料的年輕人（如毛澤東）等來說，這些譯文和宣傳品是他們了解共產主義的主要視窗。

1920年7月，維經斯基向共產國際報告：「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導部和組織部。」^⑧同年9月，「為在東亞（中國、朝鮮和日本）直接進行實際活動，（在上海）成立組織中心——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下設三個科，即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⑨。

從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經費絕大部分來自共產國際。儘管陳獨秀曾信誓旦旦說：「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我們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制於人。」^⑩但心有餘而力不足，中共最初的數十位成員大都是剛從中學或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籌集資金談何容易。李達回憶，1920年「十二月間，威琴斯基回到蘇俄去了，當時黨的工作經費，每月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卻無力負擔，因為當時在上海的黨員大都沒有職業，不能掙錢」^⑪。當時區區200元，只相當於一位教授一個月的工資（胡適在北京大學的工資每月280元）。中國共產黨的生存，離不開共產國際的資金挹注。據1922年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⑫共產國際東方部撥給中共1923年的經費預算是12,000金盧布^⑬。直至1927年，中共活動經費大部分仍然來自共產國際。可以說，沒有共產國際，就不可能有全國規模的人數眾多的中國共產黨^⑭。

中共不單成立初期在共產國際羽翼下活動，直至第一次大革命徹底失敗，也擺脫不了對蘇聯共產黨（聯共）的依附性。論者指出：「1923-1927年的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做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駐中國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然後把嚴重的後果強加給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由共產國際做成決議、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監督下，命令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監督下貫徹。」^⑮1935年遵義會議後，由於關山阻隔，聯絡非常困難，加上情況瞬息萬變，中共才獲得較多自主權。不過，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從領導人的選擇到大戰略，都奉命唯謹；即使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後，中共仍奉斯大林為導師，把聯共作為自己的領導，許多重大問題都主動匯報和請示。1949年7月中共向聯共的報告便說：「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是這樣認識的：即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央在說明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⑯

在這些莫斯科派出的人員中，以下三位最值得注意，他們深深介入了1927年國共徹底分裂前國共雙方所有重大決策。

(1) 維經斯基，在推動成立中國共產黨後，多次在俄中之間走動。共產國際先後成立遠東書記處、東方部及名稱不同的附屬機構，他都是主要負責人之一，從而成為1920年代共產國際處理中國問題的重要幹部。

(2) 馬林(Hendricus Sneevliet)，荷蘭人，第二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曾長期在荷蘭的殖民地印尼活動。1921年6月到達上海，參加了7月舉行的中共一大；1922年8月29至30日參加在杭州西湖舉行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他曾與孫中山三次會晤，致力於促成國共合作和開展工人運動；也是1920年代俄共派到中國的重要使者。他與維經斯基在好些問題上存有分歧。

(3) 鮑羅廷(Mikhail Borodin)，1923年8月到達哈爾濱，10月抵達廣州。作為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派駐廣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備受孫中山重視，被聘為國民黨顧問和委以重任，孫對其可謂言聽計從。其工作成果主要有：把國民黨改組為列寧主義式政黨；把國民政府塑造為黨國不分的準蘇式政府；辦黃埔軍校，建立起一支忠於領袖的「黨軍」，並成功地「北伐」，為國民黨長達四十多年的威權統治奠定了牢固的基礎。1927年4月、7月，鮑羅廷先後與蔣介石、汪精衛決裂後黯然回國；1949年初被捕，1951年5月29日死於遠東的勞改營裏。

共產國際帶給中國共產黨的除了經費、代表外，還有理論和活動策略。中國第一批共產黨人參加共產黨組織前後思想是龐雜的，出席一大的十三人中，因各種原因先後離開共產黨的多達七人，其中多數因理念不同拂袖而去。就影響巨大的三位領袖人物(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而言，他們的思想轉變也頗曲折。

以陳獨秀來說，儘管他幾次赴日，聲稱留學，但每次停留時間都很短，沒有系統地學過某門知識，沒有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他一生信仰多變：1920年代初選擇了共產主義，大挫折後成為托洛斯基主義小組的領導人；40年代回歸自由主義，成為批判斯大林專制統治的先驅。

隨之而來的缺陷是理論思維和邏輯不嚴密。1919年陳獨秀的聲譽登峰造極，在這年12月1日《新青年》發表的〈本誌宣言〉中，他說道：「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①他用上二十四個形容詞來闡述一個虛無縹緲的「新社會」。這不是記下思想閃光的隨感錄，而是代表《新青年》同人共同意見的宣言。只能說，這不是偶然的失誤，而是當時陳獨秀理論思維的真實表露。而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陳獨秀寫道：「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②直至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表示「十八世紀以來的政制已經破產」，「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地位底

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⑩，才顯示他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是他與維經斯基交往半年後的變化。

李大釗是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中罕見的系統學習過現代政法知識的領袖，號稱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第一人。可是，他在中共成立一年多以後、1923年1月出版的《平民主義》一書中仍然堅持：「男子的氣質，有易流於專制的傾向……若想真正的『平民主義』在中國能夠實現，必須先作婦女解放的運動，使婦女的平和、美、愛的精神，在一切生活裏有可以感化男子專暴的機會，積久成習，必能變專制的社會為平民的社會。」^⑪這些觀點顯然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格格不入。

又以毛澤東為例，這位熱衷政治、有志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青年，儘管自稱：「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⑫，實際在這一年9月28日，他仍宣稱「湖南自治是現在唯一重大的事」；並堅信「不論那一國的政治，若沒有在野黨與在位黨相對，或勞動的社會與政治的社會相對，或有了在野黨和勞動社會，而其力量不足與在位黨或政治社會相抗，那一國的政治，十有九是辦不好的」^⑬。兩個月後，他的政治態度急劇轉變，表示「深切的贊同」蔡和森提出的「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資本經濟制度，其方法在無產階級專政」^⑭。1936年毛澤東對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說過：「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⑮儘管讀這幾部書的時間回憶有些誤差，但這些書對其思想轉變起了關鍵作用則是肯定無疑的。而這三部書都是靠維經斯基帶來的資金支持，用新青年出版社的名義在上海出版的。

至於推動這些精英思想統一的主要場合是共產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中共從一大到六大，都是在共產國際代表領導下舉行的，各項決議均須獲得國際代表的首肯。頭三次代表大會，基本內容是〈提綱〉的中國化。〈提綱〉的要點是：

(1) 階級利益不可調和，必須堅持階級鬥爭，堅決消滅地主和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共產國際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其着重點應該是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彼此接近，以便為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共同進行革命鬥爭。」^⑯

(2) 打倒帝國主義。「從殖民地所取得的額外利潤，是現代資本主義財力的最主要源泉。」「殖民地的分離和本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推翻歐洲的資本主義制度。」^⑰宗主國和殖民地利益不可調和，必須堅決革命，「從而使所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民族能夠和平共處和一律平等的市儈民族幻想更快破產」^⑱。

(3) 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領導權，即獨立領導工農運動，爭取領導武裝，避免建立歐美式國家，力爭建立蘇維埃制度；可以和應當同現有的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的資產階級組織合作，但反對他們控制工農革命鬥爭，反對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實現政治的獨立」即實現英美式民主的綱領；領導工農「第一步應當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進而「創立蘇維埃共和國」^⑲。

(4) 保衛蘇俄是世界政治的中心點，是各國工人和勞動者的任務。「必須實行使一切民族和一切殖民地解放運動同蘇俄建立最密切的聯盟的政策」，「戰勝世界帝國主義」，以聯邦制為「過渡形式」，最終實現統一的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聯盟^⑳。

最後一點是俄共宏大戰略的立足點，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國共產黨人都力不從心，除了高呼口號外，實績不彰。其他三點經過中共領導和俄共使者努力，或變為廣為傳播的口號，或成了中國共產黨長期堅守的信條，導致它的盛衰和困厄。不過，說到底，策略可以隨時改變，不變的是俄共的戰略目標——把中國變為附屬國。〈提綱〉所列種種，都是為這個戰略服務的。

二 蘇俄與孫中山、馮玉祥的利益交換

組建中國共產黨是俄共着眼未來的重要一手，但百人小組織要成長為影響中國政局的重要力量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現有政治力量中尋找盟友，顛覆中國的合法政府，是俄共的另外一手。要是說宣傳共產主義和組織共產黨是公民擁有的正當權利，顛覆外國的合法政府則是踐踏國際法的勾當。蘇俄1920年代開始就將這個計劃付諸行動，早於軍國主義日本和希特勒德國，開二十世紀一國政府顛覆別國政府的先河。

在中俄兩國關係上，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蘇俄政府先後發表宣言，宣布放棄沙俄侵略中國掠取的領土、賠款和各種特權，廢除不平等條約，讓中國各界人士一片歡騰。1922年，蘇俄與中國政府談判建交，俄共中央政治局卻給談判代表發出電報說：「不能允許」按這兩次宣言辦事，要保住蒙古和中東鐵路的利益和特權^㉑。與此同時，蘇俄積極尋找和培植自己的盟友。

首先，俄國人考慮過吳佩孚，但最終選擇了孫中山。原因無他，乃由於雙方利益深度交集，孫中山願意不顧國家主權，迎合蘇俄。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和國民黨夢寐以求的目標，是把全國政權奪到自己手中。其行動軌迹表現為：第一，違背與袁世凱的約定成立臨時政府，內外交困中迫不得已才把權力交給袁世凱；第二，交權前炮製先天不足的《臨時約法》，冀圖架空袁世凱，沒有達到目的，但卻因錯誤的制度設計，成為民國頭十五年間政局亂象叢生的根源；第三，踐踏法治，輕率發動「二次革命」(1913)和「護法戰爭」(1917-1922)^㉒。惜事與願違，處處碰壁，內外交困。1920年代開始，當俄國人向孫中山伸出橄欖枝，兩者很快就結盟了。雙方的交易是：

(1) 蘇俄答應用各種方法幫助孫中山成為中國最高統治者。孫中山則同意蘇俄的要求：俄軍不必「立即」從蒙古撤退；中東鐵路仍由俄方管理（而這兩條正是吳佩孚堅決不答應的）。蘇俄認為孫氏掌握全國政權後，會成為它的堅定盟友，從而為實現其戰略目標奠定良好的基礎。

(2) 給錢。孫中山要求得到的第一筆錢是200萬墨西哥元（相當於同額金盧布）。俄共中央政治局同意這個要求，一年內付足；光辦黃埔軍校就給了270萬金盧布。

(3) 給武器，練黨軍。蘇俄一是給武器裝備和顧問，幫助孫中山編練軍隊：「已知從1924年10月到1926年7月北伐作戰開始前後，蘇聯援助國民黨的武器裝備，就有各式步槍近4萬支、機槍150挺、大炮24門、飛機15架、子彈3,600萬發、炮彈4,000發……」此外，還有久經沙場的近五十名軍事顧問^②；二是要求出動紅軍，攻打張作霖；或在新疆、蒙古訓練一支國民黨軍隊然後打進內地；更露骨的是：「孫逸仙建議……直接指明根據他的請求，我們的一個師佔領東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雙方拉上德國在那裏合作開礦，並在那裏建立蘇維埃制度^③。不過，後者難度太大，蘇俄沒有付諸行動，代之以在廣州辦軍校，練黨軍，出師北伐。

締結這一聯盟的前提是蘇俄認為剛誕生的中共不可能在短期內奪得全國政權，要實現它的戰略目標，當下需要一個寄生體。與此同時，它認為孫中山的政治影響力尚在，應該加以利用；但國民黨缺乏活力，需要新生力量衝擊。因此，共產國際特地通過決議要求中共黨員（當時總數約二百人）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

另一個重要布局是在北方培植、壯大馮玉祥的軍隊。馮玉祥依附直系後，處境不佳：「當時，馮玉祥及國民軍政治上非常孤立……馮玉祥急需擴充所部軍隊，但他既無金錢也沒有取得武器的渠道。」^④斯時斯地，俄國人來了。馮玉祥一反過去的公開言論，答應支持蘇俄關於蒙古和中東鐵路的要求，接納蘇俄顧問和以國民黨名義派來的政工人員（基本上是共產黨員），按他們的要求整訓軍隊，從而從蘇俄手中撈到一大批武器。楊奎松指出，「已知從1925年3月到1926年10月，莫斯科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裏就向國民軍〔馮玉祥的部隊〕提供了各式步槍59,357支、機槍230挺、各種大炮60門、迫擊炮18門、飛機3架、手榴彈1萬枚、步槍子彈6,970萬發、軍刀4,000把。火焰噴射器10支等大量武器裝備和彈藥」^⑤。因馮玉祥部隊駐地靠近蒙古，交通相對方便，蘇俄給其提供的武器比給廣州國民黨的還要多。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6月25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斯大林的報告，作出九點安排，其中兩條是：「採取措施，使現時的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善意的中立態度，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就讓政府分裂和癱瘓」；「倘若上一點所述措施不能成功，那就依靠馮玉祥軍隊和國民黨軍隊驅散現政府〔段祺瑞政府〕，成立有國民黨人參加的新政府。」^⑥由於「五卅運動」迅速平息，這個計劃無法實現，俄共才不得不下令改變計劃，安撫群眾，保存力量，圖謀再起。

同年10月，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計劃再次啟動。11月初，馮玉祥在張家口召開秘密會議，國民軍兩名將軍與維經斯基、蘇聯駐華北軍事顧問團領導人沃羅寧（外文原名不詳）和國民黨代表徐謙參加會議，詳細制訂了軍事行動計劃^⑦。俄共中央政治局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還決定「北京政府應當是有馮玉祥、國民黨人和其他或多或少溫和派參加的聯合政府」^⑧。同月，馮玉祥與奉系重要將領郭松齡秘密結盟。21日晚，郭松齡發表反奉宣言，要求張作霖（段祺瑞政府的主要支柱）下台，馮玉祥也出兵進攻直系部隊。

與此同時，與軍方的行動相呼應，中共北方區委策劃以群眾運動和軍事力量相結合的方法，仿效俄國「二月革命」，奪取首都政權。從1925年10月25日

至11月29日，多次發動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公開號召：「民眾武裝起來，團結暴動，首都革命」，包圍政府機關和段祺瑞住宅，搗毀章士釗等多位部長的住宅，佔領警察局，要求段祺瑞立即辭職，成立國民政府。僅因對他們的不法行為有所非議，11月29日，遊行的學生放火燒掉北京第一大報《晨報》報館兩間房屋，牽連燒毀了鄰近的三十多間房屋。如此壓制言論自由的暴行，受到全國各界人士強烈譴責³⁹。12月15日，日軍直接出兵進攻與馮玉祥結盟的郭松齡，24日，郭氏兵敗身亡；稍後國民軍也被直系打敗。摧毀中央政府的計劃又一次失敗了。

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三權分立的現代政治制度。任何國家的政制均須不斷改進。由於國民黨人不願妥協和走向極端，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穩定政局的機遇一再落空。進入1920年代，蘇俄進入成了新的亂源，加上北洋派內部矛盾加深，和平改革的機會終於斷絕。

不過，蘇俄始料不及的是，它的戰略圖謀也一敗塗地。1927年，蔣介石和馮玉祥屬下的蘇俄顧問全被禮送回國。蔣介石從蘇俄那裏學來一黨專制，建立了自己的黨國體制，但在龐雜的內涵和行動中包含着兩個合乎歷史潮流的因素：(1) 國家獨立，不願在蘇聯身後亦步亦趨；(2) 維護社會穩定和保護私有財產。這是兩個植根於人性的因素。共產國際要各國、各族人民都聽命於蘇俄的宏圖大計終歸成為鏡花水月，就是因為它與人的本性衝突。人生下來是自由的，擁有與生俱來的生命權和發展權。剝奪私有財產就是剝奪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國家獨立、國務自主所以可貴，是因為指望這個共同體能保障人的自由、安全和發展。

三 後果嚴重的三道緊箍咒

俄共策劃的具體行動隨着歷史煙波逐漸遠去，像夢魘一樣糾纏着中國人的是他們帶來的三大信條：第一，打倒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第二，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外國資本主義；第三，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共辦了三件大事：第一，經濟上消滅私有制，消滅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第二，政治上繼續搞階級鬥爭，嚴格整肅知識份子；第三，對外關係上向蘇聯「一邊倒」；支持金日成發動「偉大的祖國解放戰爭」；支持東南亞的共產黨游擊隊。這些都是上述思想枷鎖帶來的惡果。

(一) 打倒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安身立命的基石是消滅資本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誕生標誌的《共產黨宣言》明確宣告：「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⁴⁰這是對十八、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大發展帶來的黑暗面的強烈而極端的抗議，在當時當地具有一定的正義性和正當性。〈提綱〉堅持了這個基

本點，並把它傳承給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宣言〉確認：「共產主義者的目的就是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第一步就得鏟除現在的資本制度。要鏟除資本制度，只有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並以此作為「收納黨員之標準」^④。在一大通過的黨綱中，也規定以「消滅資本家私有制」和「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為己任^⑤。

這些宣示開始時只是少數人的獨白、激進群體內相互激勵的誓言，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人們認真注意。在知識份子群體中，當時關注的焦點是中國發展的三個選項：(1) 發展資本主義(以張東蓀、梁啟超為代表)；(2) 走社會主義道路(以陳獨秀為代表)；(3) 回歸傳統，建立「知足戒爭」的「農國」，反對發展以盈利為目的的工商社會(以章士釗、杜亞泉、張君勱、梁漱溟為代表)^⑥。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不過是同物異名。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從清末最後十年新政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開始，中國經濟雖然有過與世界經濟聯動帶來的短期波動，但整體上一直呈比較迅速發展的態勢。美國現代化和中國研究著名學者羅斯基(Thomas G. Rawski)的研究結論是：中國「人均產出的持續增長，成為20世紀最初幾十年中國經濟的基本特徵」，「在1914/1918-1931/1936年，國內總產出增加了五分之二，這意味着調整通貨膨脹後人均增長率是20%-25%。……各項投資迅速擴張，在1931-1936年間，固定資本形成總額超過了總產出10%。投資增長量基本上來自於國內存款金……戰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儘管稍落後於同時代日本的發展，但也獲得了巨大的進步」。值得注意的是，「經濟的擴張並沒有加大財富之間收入的差距」，而這些無非證明了「戰前中國市場經濟相當有效」^⑦。改革開放後，中國研究同一課題的著名學者如許滌新、吳承明、杜恂誠等人也得出大同小異的結論。可見鼓吹打倒資本主義，不但不合時宜，而且完全脫離實際。

〈提綱〉承認附屬國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可能的合作者。1945年中共七大決議甚至寫上：「有些人們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都是過慮。」^⑧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法律依據，它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⑨；宣布資產階級是四大民主階級之一。不過，1949年3月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議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着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⑩ 這一決議受到斯大林嚴厲批評。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斯大林寫信，接受後者的「指示」，「這種說法，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是一種危險的冒險主義的政策」^⑪。可是，毛澤東一意孤行，在1952年6月重申這個觀點：「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⑫ 「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並列，命運不問可知，消滅資產階級勢在必行。

接着就是中共開展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資本主義和相應的市場經濟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所有共產黨執政的蘇區和根據地，侵犯私人工商業的行動不勝枚舉；共和國成立後，消滅了私人工商業仍意猶未足，在農村一有機會就「割資本主義尾巴」，肆意侵犯私有財產。其後果是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但與發達國家差距愈來愈大，而且發展速度與發展水平被好些新興市場經濟體遠遠拋在後面；文化大革命期間國民經濟更陷入崩潰邊緣；在大饑荒時期餓死三千六百多萬人。如此景況，絕非偶然。私有財產是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滅私必然帶來巨大的災難。蘇聯，特別是其糧倉烏克蘭、東歐、朝鮮、中國……無一例外。

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是對消滅資本主義這一信條的最好反駁。三十多年的大發展，最關鍵的一條是恢復、發展了私有制和走上了市場經濟道路。

(二) 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外國資本主義

消滅本國的資產階級，有時不得不半遮半掩；而無所顧忌、大聲疾呼「消滅外國資本主義」或「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煽動民族情緒，卻讓一些年輕人如醉如癡。

早在1921年，共產國際打算同孫中山合作之初，就認為「主要是廣州政府可能被我們用作進行東方民族革命的工具」，「建立這種聯繫的目的是在居民中和在廣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夠在中國發動全民起義來反對日美資本對整個遠東的奴役的人物」^⑥。同時，共產國際建立了附屬於自己的中國共產黨，打倒帝國主義更成為響徹雲霄的口號。

中共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後，政治學者張奚若一眼看穿背後是蘇俄的圖謀。1925年10月17日，他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文章尖銳地指出：蘇俄的策略是中國「越亂越好，越糟越有趣。別的不說，你只看北京近幾個月來每次學潮的內幕，就曉得我所說的並不是無病呻吟或捕風捉影」，「錢，組織，勢力，軍閥幫助，都是蘇俄給他們的」。孫中山、國民黨聽信蘇俄這一套，「小之足以阻止我們的真正改革，大之足以給我們引起國際戰爭」。他語重心長地說：「帝國主義式的強盜們，不是空口所能嚇到的。」「總之，只要我們能自強……那帝國主義式的敵人，不打自倒。日本是先例，土耳其，乃近證。」此文石破天驚，引發了一場幾十人發表文章的大討論^⑦。

1930年代以來很多中國學者的共識是：第一，袁世凱以降，北洋政府不但沒有出賣國家主權，在收回國家主權方面卻頗有建樹；第二，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也不是賣國賊，除了堅持抗日戰爭的貢獻外，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領土及其他主權（香港、澳門除外）都在他們執政期間完成。

一個常識是：如果中國有足夠的力量，根本不用打，通過外交談判就足以收回外國強佔的利權；本身孱弱，高喊口號，於事無補，而根據國際法據理力爭，倒能維護甚至收回若干權益^⑧。通過遊行示威表達民意是公民的正當權利，但這些手段的應用必須遵守法律，不能破壞社會生活正常秩序，不能侵犯他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這與共產國際操縱下的暴行是大相逕庭的。

共產國際為了煽動追隨者「打倒軍閥」，肆意把中國軍政人員和其他中國人戴上「帝國主義走狗」的帽子。例如，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確認：「張作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附庸」；「吳佩孚同美國帝國主義也有聯繫，對他的任何支持也就是對在中國的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⑤③}。陳炯明「只不過是英國的代理人」^{⑤④}。其實，蓋棺論定，他們都是堅定不移的愛國者。

至於消滅外國資本主義，更是經不起推敲的煽動語言。資本的發展必然是國際性的，哪裏有利可圖就往哪裏走，蔑視國界，整個世界都是資本的舞台。本國資本要在世界資本舞台獲取優勢嗎？經過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完全可能。1930年代的中國資本已顯示了這樣的實力。

從1945年的中共七大到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法律依據的《共同綱領》，都宣布「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外國投資的容納量將是非常廣大的」^{⑤⑤}。建國之初，中國政府沒收了除蘇聯以外的所有外國企業資產。

改革開放後，改正錯誤，掀起吸引外資的熱潮。直至上世紀90年代，外國資本支配着中國的對外貿易和許多重要的製造業。進入二十一世紀，時移世易，絕大多數行業本國資本已佔支配地位；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的貿易國，順差很大；近幾年的新氣象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已超過吸收的境外資本。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威力。

在市場經濟之下，最容易贏取同情心的方法是指責工人待遇低下，貧富差距很大。經濟史確認的事實是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工人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漸提高。以中國炒得很熱的「包身工」來說，那僅是1920、30年代紡織業培訓新工人的一種方式，而且所佔比重很小；期滿後轉為普通工人，待遇就正常了。國家確有需要立法保護弱勢群體的一些基本訴求，但全面地看，實質是各種市場要素如何競爭。發展到一定階段，產品的品質要求提高，人力資本的作用提升，勞動者收入提高，勢所必至。工業革命「開啟了一個為滿足大眾的需求而進行大規模生產的時代」，「資本主義在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歷史，就是工人的生活水準不斷趨於提高的過程」^{⑤⑥}，這個過程正在中國複製。「工業革命及其導致的富裕，恰恰是資本主義的成果……至於例證，……看看蘇聯的情況，在那裏，隨工業化而來的是饑荒。」^{⑤⑦}經歷過1959至1961年大饑荒的中國人，看看腳下土地足矣，不必捨近求遠。

〈提綱〉認為殖民地、附屬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有差別，因為前者關於民族獨立的任務尚待解決，用〈提綱〉的話來說是「政治上被壓迫」。其實，問題不在不同類型國家的資產階級有沒有差別，而是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判斷有誤。資本主義隨着經濟發展自然生長，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屢試不爽。

蘇俄曾立志消滅世界資本主義。活了七十四年，自己坍塌了，俄羅斯淪為二流國家；而資本主義國家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總的說來至今仍在頑強生長。

由於消滅資本主義世界的信念根深蒂固，中共對外辦了兩件大事：第一，支持和參與金日成發動的「偉大的祖國解放戰爭」，與美國及其盟國，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第二，以推動

東亞革命為己任，一面提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一面支持東南亞各國的共產黨和游擊隊，支持印尼共產黨，支持波爾布特 (Pol Pot) …… 念念不忘「打倒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大業。前者已刻入歷史，無法抹掉，留下苦果未知如何解決，且不知還要付出多大代價；告別後者，也頗艱辛。

林彪 1965 年 9 月 3 日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講話中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北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由於種種原因被暫時拖延下去，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運動卻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個世界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移。」^⑧ 其理論框架沒有跳出〈提綱〉通過解放殖民地、附屬國來消滅資本主義世界的思路。其背景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世界共產革命領導中心東移，輪到中國人領導世界革命了。這樣的講話代表中共和中國政府的意見，不是個人的即興感想。

這樣的宏圖大計，弄得中國與有關國家關係非常緊張。直至 1980 年代中國共產黨才幡然覺醒，知道蘇俄鼓吹的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早已過時，和平與發展是當代兩大問題^⑨；於是斷然停止對各國叛亂者的支持，解除了鄰近國家的恐懼。

世界上確有帝國主義和侵略者，他們的侵略行為應該堅決反對。但其中既有資本主義國家（如日本），也有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建立平等的國家關係，取決於多種因素，與消滅資本主義風馬牛不相及。

（三）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共產黨消滅資本主義和打倒帝國主義的手段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理論在認識領域，片面強調了有關階級和階層利益的衝突，完全忽視它們相互依存的基本面，抹殺了互利共贏的可能性；觀察歷史，對其破壞性視而不見；處理現實問題，不惜製造或激化矛盾，唯恐天下不亂。主要有幾大特點：

1、隨心所欲，製造階級鬥爭，劃定階級敵人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是制止動亂，掃除不穩定的因素，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亂源既來自軍閥，也來自打着革命旗號發動的內戰；二是改革國家機構，實行民主，保障公民的自由。

1922 年 7 月 11 日，馬林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像過去俄國農民和現代印度農民中所存在的階級鬥爭，對中國農民則不存在，也沒有聽說過像印度和朝鮮農民必須交付的那種高額賦稅。因而，整個農民是中立的。」^⑩ 1924 年 1 月 18 日，毛澤東向鮑羅廷匯報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湖南、浙江、廣東）發動農民鬥爭地主，「結果怎麼樣呢？…… 所有這些農民不僅未認識到我們是在為他們的利益而鬥爭，甚至還仇視我們，他們說：如果不把我們組織起來，就不會

發生任何災難，任何不幸」，「一般地說在中國社會分化還沒有達到能夠進行這種鬥爭的程度」^⑥。

中外學者許多研究認為中國土地問題並不嚴重，大地主很少，絕大多數是中小地主。最突出的如陝西省，省政府在報告中說：土地改革中關中地區四十一個縣市「土地比較分散，可沒收徵收的土地很少」。土改前「該地區半數以上的人口屬於佔有土地與其人口比例幾乎一致的中農，而中貧農總計的人口與土地均佔到80%以上」^⑦。既然如此，只要工商業不受外來干擾，持續發展下去，把農民吸收到城市，他們的景況就會逐漸改善。對為數不多的大地主和不恰當的土地佔有，通過政府干預，立法調整，不難解決。可是，中共領導人迫不及待，用最極端的語言鼓動農民起來造反。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中共用國民黨的名義，在廣州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前後六期，培訓八百多人。毛澤東和其他人一樣，把最極端的觀點灌輸給學員：「開工廠的資本家與工人的利益是絕對衝突的」；「遠自文武諸公，以至於現在各學校（都沒有談論農民問題，現在的農業學校）不過是研究如何發展農業，使農村變成資本化；他是代表資產階級如何侵略農村，並不是幫助一般貧農求解放」；大聲疾呼「中國革命是農民革命」^⑧。

搞階級鬥爭，可以隨心所欲，把公民分為三六九等，任意決定誰人該打該殺。

1926年9月25日，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發表文章說，當前的國民革命，目的在「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哪些算是半封建勢力？他一口氣開列了十三種人，把奉直軍閥放在首位，不出意外；令人口瞪目呆的是大學教授和各種宗教教徒竟然在列。此外，六個政見不同的政治派別：研究系（梁啟超、張君勱、丁文江、蔣方震等人），聯省自治派，國家主義派，復辟派及新社會民主黨，老民黨（國民黨元老），交通系，統統成了該消滅的敵人；官僚和洋行買辦不分青紅皂白全要打倒^⑨。當時梁啟超已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埋首故紙堆，偶爾對時政說幾句話而已。其他被指責者絕大部分只是有自己政治見解的流派，在當時比較自由的環境下，連各地商會也毫無顧忌發表對國內外大事的意見，知識份子講幾句話，為何要被打倒和消滅？

無獨有偶，比陳獨秀更早，1925年12月，毛澤東發表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未經建國後刪改的原文中，作為革命敵人的大資產階級，就包含「工業家（如張謇、盛恩頤等）」、「反動派知識階級……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專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⑩。1924至1927年間，瞿秋白、恽代英等人都宣稱要「無寬恕的反對民族資產階級」^⑪。中共第一個綱領規定：「中國共產黨徹底斷絕與黃色知識份子階層以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繫。」^⑫可見，這些不是中共個別領導人的偏激言論，而是其領導層的共識。

2、手段殘酷，罔顧法紀，不講信譽

列寧早就說過，無產階級專政是無法無天，不受任何約束的。他的中國學生忠實傳承了這個精神。

1926年7月舉行的中共中央第三次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就指出：「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往往敵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受很大的損失。」^⑥在蘇區和根據地建立後，變本加厲，每一次解決土地問題，必然伴隨亂打亂殺。1947年土改中，晉察冀中央局在執行劉少奇指示，學習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真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民的意見要打人、殺人，領導機關也不能制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眾意見就是政策，就是法院』，『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阜平縣不到半個月打死了300餘人，平山縣3天就打死了100多人，冀晉區在複查運動中被殺者多達4,000多人，直接受到這種亂打亂殺風潮衝擊的就有七八個縣幾十萬人之多。」^⑦

取得全國政權後，號稱「改革」，理應平和、有序一點吧？舉個小例子：1951年7月16日，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巡視組報告：「惠陽潼湖區欣樂鄉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燬煙、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羅有用小蛇、大螞蟻裝進地主褲襠，還有吊乳頭、熏煙火、坐水牢、睡勒牀、點天燈、假槍斃等刑訊方法。」^⑧這不是個案，全國各地皆有這一類情況。時至二十一世紀，肉刑，刑訊逼供，在全國司法機關屢禁不止，正是這一源遠流長的野蠻傳統的流毒。

官方的中共黨史解析學流行一個說法：陳獨秀右傾導致1925至1927年大革命失敗。其實，共產黨在它權力所及之處「無法無天」，才是它被拋棄的根本原因。劉少奇說^⑨：

我認為一九二七年前，我們還犯了左傾錯誤，尤其是在工人運動中……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

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每日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

這些事幹起來而且越幹越厲害……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貨物的缺乏……而工人運動是當時共產黨員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到共產黨身上。

由此可見，不能責怪領導工農運動和在基層工作的共產黨員胡作非為，他們僅僅是忠實踐行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

在中國這樣的沒有法治傳統、契約精神稀薄的國度裏，政黨不講信譽也屢見不鮮。1945年的中共七大信誓旦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採取合作的而不是採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⑩兩年後，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報告中居然提出：「在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時候，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的所有政黨都應當從政治舞台上消失。」只因斯

大林不同意，這個圖謀才沒有實現^㉔。此類出爾反爾的言行，在中共歷史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

3、統制思想，剝奪言論自由，打擊知識份子

階級鬥爭在共產黨未取得政權的時期或地區，往往是暴民專制的別名。取得政權後，階級鬥爭變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隨意制裁任何階級和個人。除了消滅地主和資產階級，特別着意統制思想，整肅知識份子，旨在撲息反對共產黨的思想火種。

從1951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批判胡風、胡適，反右到文革，中國知識份子反覆在「改造」的煉獄中煎熬。為甚麼會如此？一個說法是這是毛澤東對他青年時代受歧視的反擊。1936年，他曾憤憤不平地說：1919年在北京大學時，「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洋。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㉕。毛澤東有睚眦必報，此說不能說毫無道理。但迄今毛和其他人都沒有留下他人如何不把他當人看的材料。從學生到教授對一個圖書館職員沒有特別關注，非常正常。如此耿耿於懷，有胸懷狹隘之嫌。掌握最高權力以後，知識階層山呼萬歲之際，毛澤東志得意滿，早年「屈辱」早已得到千百倍的補償，因陳年小事大動干戈，可能性極小。因此，災難來自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信念：

第一，與傳統觀念決裂。《共產黨宣言》宣布：「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㉖作為傳統觀念載體的知識階層，逃脫不了被改造的命運。文革的核心觀念，就是這兩個決裂。每一次整知識份子的藉口都是他們沾染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等不良思想。建國後不久便拿當年毛澤東急於追隨的胡適開刀，罪名是買辦和資產階級文人，近乎大義滅師，正好證明毛關注的不是個人恩怨。

某一觀念屬於哪個階級，放進學術領域，可以討論千年而無定論。以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的語錄為標竿是否可以是非立判呢？他們的話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且自相矛盾和前後不一之處甚多，引用者的慣技從來是各取所需。在人們實際生活中是權力至上，大小機關的首長，造反時期的草頭王，誰掌權，誰的話就是判別是非的標準。

第二，列寧主義的國家觀和政府體系的定位。蘇維埃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在這個國家裏，共產黨領導一切，一切行政機關，立法、司法機構，工商企業、工會、青年團和其他群眾組織、學校……都是這個體系的組成部分；它還擔負教化功能，「使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完全脫離資產階級」^㉗。全國是一張大網，沒有公民的個人獨立，更沒有區隔個人和政權的公民社會，沒有公民權利觀念和保障制度。

在這個體系中，知識階層不過是有用的工具。所謂尊重或不尊重知識和知識份子，不過是領導方法的差異，與這個體系的結構無關。共產黨要領導一切，包括領導人們的思想，動輒「統一思想」，言論自由和公民的政治權利與這個體系是格格不入的。

1924年1月，毛澤東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蓋以自由給與反對黨，革命事業便十分危險。」^⑦稍後，身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又斬釘截鐵地說：「言論只讓多數人自由，那少數人的自由一定給他剝掉，和着以前恰恰相反。」在廣州和以後革命軍隊所到之處，中間派的報紙也不能存在^⑧。毛澤東對傳媒的定位是：「通訊社及報紙是革命政策與革命工作的宣傳者組織者」^⑨。

馬克思非常重視言論自由，到了列寧及其追隨者那裏，便沒有這一說了。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對外大肆宣揚民主、自由。就在那時，彭德懷說了幾句「從思想自由原則出發」、「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之類的話，毛澤東勃然大怒，專門寫信斥責^⑩。1959年廬山會議上，又把這個陳年老賬翻出來，意在說明彭不過是混進來的同路人。

四 餘論

回首百年，不管人們承認不承認，中國確實走了一段大彎路。根源是上述三道思想緊箍咒捆住了中國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執政黨勇敢地拋棄了消滅資本主義和世界革命的幻想，整個國家面貌煥然一新，但階級鬥爭和專政仍被一些人奉為鎮國之寶。於是，作為現代國家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心中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要完成現代化大業，即使光從經濟領域講，也急需把中國變為留得住人才和財富的窪地。可是，現實的景況是很多中產者已經或正在考慮移民，弄個外國護照作為人身安全的保險成為一時的風向。2016年，稍不留意，外匯儲備就減少了四分之一（1萬億美元）；其中一部分是對外投資，頗大一部分是變相外逃。

國人應該見微知著，勇敢地進行改革。為此要冷靜地思考一些根本問題，有四條教訓永遠不應忘記：

第一，私有財產和公有財產一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是生命生存、發展和繁衍的基礎；任何公民的財產，除非犯了有關罪責，絕對不可剝奪。沒有就這個問題進行充分的辯論，是新文化運動的重大缺陷。而企業家（資本家）是現代公民的平等一員，更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支柱，政府沒有改造他們的權力。

第二，保障公民的自由是政府的職責；言論自由不可限制。發聲、說話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人人都有思維能力，都有表達自己意願和見地的訴求和權利。任何人的言行都有對錯，神化個人是愚民騙術。言論自由不以內容對錯為前提。對自由的限制僅限於對他人權利的侵犯和有破壞當下社會秩序的危險。

學術和思想自由是現代大學的生命線，是現代公民不可剝奪的權利。有關官員以為：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可以給予充分自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則要加緊思想控制。他們忘記了學術是非的判斷非常困難，恰恰是缺少世界社會科學進展的常識，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犯了難以彌補的大錯誤；

何況人不是機器，不可能有觀察社會整齊劃一，研究自然卻能個性飛揚、創造性迸發的腦袋。有的學者揚言，要根據中國的需要和經驗重新界定人文社會科學的概念。踐踏常識、哄騙外行，莫甚於此。現代學術本性就是國際性的；給經濟學、法學、史學、社會學……劃階級，定國籍，不過是階級鬥爭理論餘毒的標本。如果被當局採用，將摧毀中國學術和中國的大學，為鎮壓知識階層提供根據。不幸，從最近的有關舉措中，可以看到這一獻策的陰影。

第三，知識階層是社會平等的一員。知識階層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支柱，政府有保障他們的自由的責任，沒有改造他們的權力。知識階層是知識和文化的載體，他們有傳承和發展學術文化的責任和能力。「以吏為師」是專制社會的標誌，官員向老師請教，有何不妥？工農兵有尊師的傳統，「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不過是壓制和折磨知識人的騙局。

現代社會人人平等，各階級、階層不應有高低貴賤之分。不能再處心積慮把知識階層鍛造成為「聽話，出活」的工具；讓中國的年輕人不要在動輒得咎的氛圍中生活，成長為敢說、敢笑、敢幹的現代公民。

第四，法治國家與階級鬥爭、個人崇拜水火不相容。進入二十一世紀，法治國家成了大小官員的口頭禪，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現象。但我們要牢牢记住：首先，法治是保障公民自由的制度；法治與階級鬥爭是水火不相容的。當下中國，地主沒有了，資產階級是政府努力扶持的，要與哪個階級鬥爭？與國內外「敵對勢力」鬥？各國政府都有情報機關，他們的行動出格了，依法處理可也，談不上甚麼階級鬥爭。有的官員喜歡大談國內「敵對勢力」。但如何界定和處理所謂「敵對勢力」？法定罪名有這一條嗎？法定程式又如何？不能打出階級鬥爭旗號，就任意行動，把往日對敵鬥爭那一套搬出來。建設法治國寫入憲法後還在高唱階級鬥爭，是踐踏憲法和法律、侮辱現代文明的行為。

其次，法治是限制政府權力的制度。大小官員都是公民、傳媒、人大、政協監督的對象。越出民主制度，搞個人崇拜是災難的開端。從蘇聯到中國，慘痛的教訓歷歷在目，絕對不應重蹈覆轍。

這四條是現代社會的常識，是邁向富強、文明的現代國家的光明大道。蘇聯與它們背道而馳，終歸崩潰。深研英國富強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沉淪的教訓，嚴復1896年沉痛地說：「身貴自由，國貴自主」，國家盛衰的關鍵是「自由不自由」^①。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Amartya Sen)也說：「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②哲人智慧，應該記取。恢復經濟自由，造就了今日中國經濟；沒有全面的自由，不可能真正成為一流的現代國家。

註釋

① 本文提及的蘇聯，不單指成立於1922年12月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也包括其前身蘇維埃俄羅斯聯邦——蘇俄；為敘述簡便起見，蘇俄、蘇聯互為代稱。

- ②③④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1920年7月)，載黃曉玲主編：《「二大」和「三大」——中國共產黨第二、三次代表大會資料選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8；9；10。
- ③④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49；73。
- ④ 巴弗雷(Nicolas Baverez)：〈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時代〉，載阿隆(Raymond Aron)著，楊祖功、王甦譯：《雷蒙·阿隆回憶錄》，增訂本，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1-2。
- ⑤⑥⑦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30；119-20；121。
- ⑥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1。
- ⑦ 〈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頁27。
- ⑧ 〈維經斯基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頁31，同頁編者註說：「在四名中國革命者當中，肯定有陳獨秀。」此外又談到：「其中包括有影響的社會主義報紙出版者李同志」，估計是李達。參見〈關於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頁53。
- ⑨ 〈維連斯基—西伯利亞科夫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1920年9月1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36。
- ⑩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1979年5月)，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384。
- ⑪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載《「一大」前後》，第二冊，頁9。
- ⑫ 〈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載《「二大」和「三大」》，頁56。
- ⑬ 〈中國共產黨1923年支出預算〉(1922年12月)，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185。
- ⑭ 唐寶林：〈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代序)〉，載《陳獨秀全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15。
- ⑮⑯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7；7。
- ⑰ 陳獨秀：〈本誌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頁2。
- ⑱ 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第7卷第1號，頁16。
- ⑲ 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頁8。
- ⑳ 李大釗：〈平民主義〉(1923年1月)，載《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頁423。
- ㉑ 〈毛澤東回憶黨的「一大」前後의思想和活動〉(1936)，載《「一大」前後》，第二冊，頁244。
- ㉒ 毛澤東：〈再說「促進的運動」〉，原載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28日)。轉引自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補卷》，第一卷(東京：蒼蒼社，1983)，頁233。
- ㉓ 〈毛澤東給肖旭東蔡林彬並在法諸會友〉，載湖南省博物館歷史部校編：《新民學會文獻彙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102、105。
- ㉔ 〈毛澤東回憶黨的「一大」前後의思想和活動〉，頁244。1941年毛澤東曾重申這句話。參見毛澤東：〈關於農村調查〉，載《毛澤東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378-79。

- ②⑦②⑨ 〈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1920年7月28日)，載《「二大」和「三大」》，頁2；2；3、5、6。
- ③〇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24號記錄(摘錄)〉(1922年8月31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115。
- ③① 參見袁偉時：〈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合力摧毀民初憲政〉，《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頁4-30。
- ③② 〈越飛給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1923年1月26日)、〈越飛給契切林的電報〉(1922年11月7日和8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213-14、149。
- ③③ 劉敬忠：《馮玉祥的前半生——兼對其自傳〈我的生活〉的辨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73。
- ③④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8號記錄(摘錄)〉(1925年6月25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637。
- ③⑤ 〈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1925年11月11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733。
- ③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3號記錄(摘錄)〉(1925年12月3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742。
- ③⑦ 袁征：《孔子·蔡元培·西南聯大：中國教育的發展和轉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第十五章，「『首都革命』與激進思潮」。
- ③⑧③⑨ 馬克思(Karl Marx)：〈共產黨宣言〉，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265；271-72。
- ④① 〈中國共產黨宣言〉(1920年11月)，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頁1-2。
- ④②④③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1921年)，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頁6。
- ④④ 袁偉時：〈從章士釗看20世紀中國思潮〉，《浙江學刊》，2002年第3期，頁46-63；《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7)，頁410、248、699。
- ④⑤ 羅斯基(Thomas G. Rawski)著，唐巧天、毛立坤、姜修憲譯：《戰前中國經濟的增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頁335-36、337、338。
- ④⑥④⑦④⑧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載凱豐主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哈爾濱：東北書店，1948)，頁314；336；317。
- ④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全文〉(1949年9月29日)，載新民主出版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文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頁262。
- ④⑩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465。
- ④⑪ 毛澤東：〈現階段國內的主要矛盾〉(1952年6月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31。
- ④⑫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關於廣州政府的報告〉(1921年4月21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63、64。
- ④⑬ 張奚若：〈蘇俄何以是我們的敵人？〉，載章進編：《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頁56、58。
- ④⑭ 1927年民眾遊行示威，衝進漢口和九江租界，收回主權，那是特例，須具體分析原因。限於篇幅，本文不涉及。
- ④⑮ 〈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不晚於1922年12月5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162。
- ④⑯ 〈越飛給吳佩孚將軍的信〉(1922年11月18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156。
- ④⑰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對流行的有關「工業革命」的種種說法的評論〉，載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編，秋風譯：《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177、179。

- ⑤7 赫森 (Robert Hessen)：〈工業革命對婦女和兒童的影響〉，載《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頁 229。
- ⑤8 參見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頁 40。
- ⑤9 何方：《何方自述——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自印本，2011），頁 424。
- ⑥0 馬林：〈給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載《「一大」前後》，第一冊，頁 421；〈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關於廣州政府的報告〉，頁 63。
- ⑥1 〈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不早於 1924年2月16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頁 470。
- ⑥2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頁 49。
- ⑥3 毛澤東：〈農民問題〉，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文獻資料》（內部印行，1983），頁 88、93。
- ⑥4 陳獨秀：〈我們現在為甚麼爭鬥？〉，載《陳獨秀文章選編》，下冊（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 261-62。
- ⑥5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載《革命》半月刊（1925年12月）。轉引自馬恩列斯著作研究會編輯出版部：《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總第六十期（內部資料，1981），頁 17。
- ⑥6 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載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 712。
- ⑥8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議決案〉（1926年9月），載《六大以前》，頁 595。
- ⑥9 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一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頁 49-50。
- ⑦0 廣東省土委巡檢組：〈惠陽博羅第一階段工作檢查報告〉（1951年7月16日），廣東省檔案館，236/1/23/39-40。轉引自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第一冊，頁 151。
- ⑦1 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 5 期，頁 3。
- ⑦3 〈斯大林關於對待反對派政黨立場致毛澤東的電報〉（1948年4月20日），載沈志華、李丹慧編：《中蘇關係檔案》電子版，SD090025，沈志華提供。
- ⑦4 吳黎平：《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關於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 33。
- ⑦6 參見斯大林 (Joseph Stalin)：〈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主義問題》，第二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頁 133-42。
- ⑦7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十四號（1924年1月29日上午），載《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1），頁 50。
- ⑦8 潤（毛澤東）：〈向左還是向右？〉，《政治週報》，第 2 期（1925年12月13日），頁 13。
- ⑦9 毛澤東：〈通訊社和報紙的宣傳應符合黨的政策〉（1942年10月28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二卷，頁 454。
- ⑧0 毛澤東：〈批判彭德懷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的一封信〉（1943年5月6日），載竹內實主編：《毛澤東集》，第九卷（東京：北望社，1971），頁 13。
- ⑧1 嚴復：〈論世變之亟〉、〈原強修訂稿〉，載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17。
- ⑧2 森 (Amartya Sen) 著，任蹟、于真譯：《以自由看待發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頁 7。